

#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角色名称的意义重构



彭可\*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 文学作品常通过角色名称来推动情节发展, 为故事埋下伏笔, 对于传递文本信息有重要作用。市场上流通的译文中, 角色名称多采用音译法。通过同音汉字来传递角色名称的含义, 译者创造受到限制, 原文含义流失过多, 作者与目的读者之间的桥梁无法联通。本文通过选取戴乃迭的《边城》英译本, 探讨角色名称在译者主体性下如何就语言创造性、文化创造性与审美创造性三大基本特征重构意义, 贯通语篇, 借此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译者戴乃迭跳脱出了“守旧”的桎梏, 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 采用创造性的翻译保留语言魅力, 联通不同语言中的文化和审美, 突出人名与角色的关联性, 取消角色名字天然的无序性, 重构角色形象, 力求完美还原角色特点, 保留原文韵味。推而广之, 译者当兼顾翻译中的多样性原则与灵活性原则, 因“文”制宜, 在提升读者阅读体验的同时, 让中国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意义重构; 《边城》; 角色名称翻译

**DOI:** [10.57237/j.cll.2023.03.003](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3.03.003)

## Re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Coherence of Characters'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Peng K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Characters' names in literary works are key to conveying text information, which is applied to motivate the plot and to foreshadow the ending. In existing translated texts, the characters' names most apply the transliteration. Delivering the connotation of names in a text by homophonous Chinese limits the creativity of translators and loses much of the beauty of the source text, thus breaking the bridge between the targeted readers and authors.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order Town* by Gladys B. Tayl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under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ow characters' names achiev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coherence from the creativity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aesthetics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influence. Getting rid of rails, Gladys, a translator,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pply the creative translation to retain the charm of language expressions, reconnect culture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out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their names, cancel the natural randomness of names, reconstruct the images of characters and reappear their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By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is point,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ty and flexibility when converting the source text into the targeted one. Applying various measures to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translators are encouraged to improve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 thus revitalizing Chinese stories in the new era.

\*通信作者: 彭可, pengkedonna@qq.com

**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e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Coherence; *The Border Town*; Translation of Characters' Names

## 1 引言

译者一直游离在文学作品之外, 被视为工具化的存在。随着翻译学界出现“文化转向”, 译者形象才逐渐展露在大众视野中。翻译就此转变为由译者主导的与文本和作者所进行的交互活动, 其活动的产物为译本, 而译者也得到认可, 一跃成为文本与意义的“重构者”。角色名称富有极高的审美性与文化性, 译者在处理角色名称的翻译时, 需下大气力使其在新的文化时空焕发生机。本文以戴乃迭所译的《边城》(下文简称为“戴译”)中为例, 探究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角色名称如何重构意义, 贯通语篇。

## 2 理论基础

### 2.1 译者主体性

传统译论中,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被简化为语言转码的一项工具, 提供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意义等值。这一点从形容译者的比喻中就可窥见, 如仆人说、隐身说、朝圣者。文化转向后, 翻译研究开启对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深入研究, 研究视角从传统的静态文本研究切换至动态的译者主体行为研究, 译者一跃成为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周领顺二十余年深耕于译者行为研究, 提供了三大研究路径, 成为该领域领军式的人物。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国外学者 Douglas Robinson 所进行的“译者转向”研究并驾齐驱, 成为了该领域的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研究, 同时拓宽了翻译的定义[1]。自此, 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性行为, 一举跃升为一种“有意图的”的社会文化行为[2]。Fenouillet 进一步拓展了“有意图”的概念, 他将译者所面临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多个集合, 翻译行为使其产生交互作用, 而其中除了译者主体性, 文本与译者主体间性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翻译由此不再是一种机械式的转化活动, 而是一种以译者为主体, 存在多种可能性的主观行为。

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 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从哲学观点来看,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

地改造、影响、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4]。主体性分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 查明建、田雨等人将此概念引用至翻译研究中, 界定了译者主体性的含义: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表现为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许钧认为译者主体性重在其审美性与审美创造性[6]。廖志勤将译者主体性界定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时代文化语境和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在思想意识、文化价值取向、翻译理念及审美意识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7]。周领顺提出, 在引入“译者主体性”后, 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忠实”, 衍生出不同理解, 消解了文本的绝对性, 注重译者的自主创造能力, 故翻译仅反映了译者以原作为价值取向的态度与其所进行的尝试[8]。

归结上述学者看法, 译者主体性的关键是在于“自觉创造性”, 故依据创造的内容, 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可划分为翻译主体自觉的语言创造性、文化创造性与审美创造性。

### 2.2 译者主体性之于意义重构

对译者而言, 翻译最大的难题则是两种语言的差异。巴别塔上, 上帝将人类拨弄至不同之地, 予其形式各异的语言, 从而滋长出不同文化。文化偏好不同, 审美期待也随之百花齐放。

首先, 语言表达形式包括语言文字的表示方式和语言内部的表意方法。中英两种语言除了文字形式不同外, 在表达思想时, 也各有不同。中文善欲扬先抑, 重点置后发掘。而英文却喜先表明态度, 再步步分析。此类差异比比皆是。在此, 语言表达形式的定义取后者, 即表情达意的叙述方法。

与语言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文化内涵指一个民族在固定生存的环境下所形成的独有文化特征。这一特征会折射进民族的行为、思想中。各地的传统节日、地方习俗大不相同, 都是其文化内涵的体现。所以在

一种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却闻所未闻，无法理解，这一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在一个国家内，地区不同，文化观念也不互通，例如中国南北地区的“甜咸”粽子之争，动物崇拜对象不同。

由此，人们对事物的感知自然不同，对于美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所以审美期待与前两者环环相扣。例如，中国以“白”为美，常说“一白遮百丑”，西方世界以“小麦色”为美，认为这是健康的写照。不同语言文化下，小到个人肤色，大到“美”的定义，要融通其间审美差异并不是件易事。

这些由语言本身的异质性和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差异性，以及原文语言形式的暗示作用和联想作用产生的缺省，称之为意义真空[9]。译者通过语言形式对原作进行再反映，犹如在异域土地上开垦新花园，以求扎根一方水土，符合审美期待，实质上就是利用自身的主体性对原作各成分间关系的一种重构，从而达成文本的语言、文化及审美的连贯。进而，译者摆脱掉语言差异“发现者”的身份，成为文本与意义的“重构者”。故翻译的过程即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时空重构的过程，而译者与文本，乃至作者进行沟通对话，实现交融共生，即为翻译。

在语言区别与共性中，如何发掘其表达形式、文化内涵与审美期待，进行创造性地再反映，以上命题都需要译者自主思考，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就要求译者基于语言表达、文化内涵与审美期待三方面，对原文充分理解渗透，客观估计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对原文本进行适当的操纵与变通，建立理解话语的必备条件，从而在译文中重构原文，贯通语义。

### 3 角色名称翻译背景

人名作为一种区别符号，继承了人的性质、意志，蕴涵了人的精、气、神，并传达着天地之玄机[10]。这一点更为明显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浓缩了社会生活的多个层次，镜像实际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揭示人物性格命运及其与作品的背景结局间的关系往往赋予笔下的人物特定内涵的名字。Charron 特别指出，人物命名与其译名通常不止依靠语义，而是超越语义与外部现实事件，由作者或译者的审美情趣所主导[11]。相对现实中的人名，小说的角色名称与时代背景关联性更强，富有文化性与审美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目前中英人名翻译最为普遍直接的方式是音译

(transliteration)。所谓音译，是指把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用另一种语言中与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表示出来的方法，常用于目标文本中出现语义空缺之时[12]。但是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发生碰撞，必然会出现空白点，无法产生共鸣，导致意义真空的情况。汉英姓名根植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之中，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各异。如用音译粗暴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信息对调，那么读者知其音，而不知其意，文意尽数折损，读者体验出现断层，实属下举。

名字集各族文化之大成，汇书者之重望。译者当沟通好源语文化语境与目标文本的文化语境，杜绝意义缺省，让目标文本读者获得与源文本读者一样丰富的阅读体验。现以戴译《边城》中的人名译法为例，分析译者主体性如何在角色人名翻译中重构意义，达成语言、文化与审美的连贯。

## 4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角色名称翻译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13]。《边城》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解放前的湘西地区，按照书者的说法，这是“万恶的旧社会”理当“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但《边城》却是一曲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田园牧歌”，透露着一股不急不缓的澄净，描画了一个又一个淳朴的湘西人民。书中描绘场景极具湘西本土特色，展现了地方文化风俗。沈从文融合湘西方言，以人名浓缩湘西情怀，蕴藏小说线索。

故事以孤女翠翠展开，当地执事者顺顺家有二子，唤作天保与傩送，两人均迷恋上单纯美好的翠翠。性情淳朴的湘西伢子想要通过唱山歌一比高下，翠翠若是爱上谁的歌声，另一人则自愿退出。然而，飞来横祸让浪漫纯净的爱情故事化作悲剧，黯淡散场。

戴译《边城》初刊于国家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彼时，外文中译一派繁荣之景，反观中文外译却屈指可数。由此，供职于国立编译馆的戴乃迭力求宣传中国文化，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幻想。出于“对外宣传”的政治需要，戴乃迭所译《边城》必然更多顾忌文化传播影响与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译者在处理小说中人名时，融合多种不同的翻译技巧，积极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力求将极具文化特色的人物名字传达给译入语读者，避免意义缺省。



## 4.1 语言创造性之于语义连贯

英文中鲜有含数字的人名，同族之内也少见以辈分称呼，大多直呼其姓名。中国却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上下有义”。先秦时期，《左传》中就有记录，兄弟之间排辈，以“叔伯仲季”相称。而后以辈分称呼的方式则是更为直截了当。按照清代学者俞樾在其所著的《春在堂随笔》卷五所著，宋元以来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称呼，通常是以其在家中的行辈排列，用数字命名，如“王二”[14]。沈从文书中就留有许多以数字命名的人物，如“大老”、“二老”、“张三”、“李四”。大老和二老为湘西方言，意为“老大”、“老二”，即家中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实指书中顺顺家的天保和傩送。译者在此摒弃常规“音译”的方法，打破人物名字的无序性，并且未用角色的大名代称，创造性地将人名中数字直译，译名为“Number One”和“Number Two”。

由于大老和二老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人物，他们除了本名外，还有各种译名。多个名字代指同一人，如若将其一一音译，那么目标读者在阅读时必然会由于名字繁杂，误解人物关系。译者通过“Number One”和“Number Two”这一组数字天然的顺承关系，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在文中，借用书中其他人物的对话，轻松将两兄弟的本名、译名和小名串联起来。“Who is Number Two?” she asked in astonishment. “Don't you know Number Two?” It was his turn to be astonished. “Nuosong, of course. The Yue Yun of the waterfront. He told me to see you home.” [13]

相较于音译而产生文义的空白点，直译则清楚地阐释了文本意义，将中国的行辈之序和长幼之别的传统思想巧妙地蕴含在内，借用角色名字暗示了人物间的逻辑关系。

译者处理张三与李四时，同样译成“Chang the Third”和“Li the Fourth”。原文中是爷爷看出翠翠对傩送有意，打趣问到翠翠是否记得傩送，翠翠因少女情怀感到害羞，于是恼怒地冒出：“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13]”在现代汉语中，张三李四泛指某人或某些人。中文常说“张王李赵遍地刘”，证明张王李赵刘为大姓，具有较强代表性，故张三与李四演变至现代汉语中泛指的含义。英文中对应泛指某人的常用词为 somebody。此处译者译为“How can I guess? Chang the Third or Li the Fourth [13]”。意为张家第三个孩子与李家的第四个孩子，如前文所述，“张三李四”多用英文中的 somebody 代称，但是译者一改前人做法，将泛泛而指的某人具

化为有身份信息角色，在此创译出家族辈分，凸显出中国家庭追求“人丁兴旺”和“纲常伦理”的传统观念，避免了使用 somebody 可能造成的歧义。同时，译者读者铺垫了中国文化的引子，以待日后发掘。

译者在英译文本里，创造性地直译了角色名称中的数字，打破了常规的音译与对应的惯用语，以此表现出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用意。

## 4.2 文化创造性之于语义连贯

前文已然提及音译作为最普遍的人名翻译方式，为人诟病已久。音译仅粗暴地将发音转换给译入语读者，缺少充实的文化背景知识，如此译名只能是囫圇吞枣，知其形，不知其味，失去了人物形象的灵魂。沈从文《边城》的主线人物船总顺顺家两兄弟，哥哥名为“天保”，弟弟取作“傩送”。两兄弟的名字各自承载着父母的希望。“天保”意味上天保佑。少年天保精明强干，忠孝节义，自幼不需父母操劳费心。顺顺的另一个孩子名为“傩送”，借用湘西地方文化的保护神“傩神”之名，指明“傩送”是傩神送来的孩子，表明了父母的偏爱。

如用音译“Tianbao”和“Nuosong”一笔带过，西方文化中并无与之相对应的语境知识，势必造成意义缺省。文化背景的不同常谓之翻译痛点。一种文化中不言自明的却在另一文化中，难以言状。译者要费尽心力，才得以明了。此处，戴乃迭巧妙地将两兄弟名字背后的隐喻补偿至前文中，如“*When the boys were young, Shun Shun realized that his first-born took after him and would have no trouble making his way in the world, while the younger boy was cast in a finer mould. He had a soft spot in his heart for the younger, giving him the name Nuosong, his brother that of Tianbao [13]*”。

顺顺以为“天保”自有上天庇佑，一生将平安顺遂。然而天不遂人愿，天保因一次意外落水，英年早逝。此时人物名字与其命运产生强烈反差，人物的结局颇为讽刺，命运般的促成了翠翠的悲剧。沈从文淡淡写道“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漩水里就淹坏了。[13]”天保水性极好，最终却毙溺于水中。主角的结局就借用旁人之口，轻描淡写地收场了，全篇甚至未提“死”，只用“坏了”，不痛不痒。作者用这一暗线寄寓了瞬息瞬灭，人生无常的哲理。

译者在此舍弃原有意象，利用补偿策略增补解释性的话语“*have no trouble making his way in the world*”。短语“*have no trouble*”表明少年本应一路是坦途，保留

了极强的反差感，与后文天保在爱情路上处处坎坷，未壮即歿，前后呼应，形成对比。

弟弟“雉送”自幼天赋异禀，是十里八乡的美男子。这一点恰好显现出人物形象与其命名的关联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仍是个神秘的国度。在文学作品中过度渲染中国鬼神，不利于中国的“科学”的形象传播。如若重新加注，说明雉神形象，反有“蛇足”之嫌。译者“弃车保帅”，使用“cast in a finer mould”短语表明雉送与生俱来的天赋，用目标语惯用表达疏解源文文化内涵，完成语义在文化形象上的连贯。

以上两则译文虽消解了源文的文化语境，但利用翻译技巧补偿音译缺陷，丰满人物形象，成功地重构了源文本中人物的文化内涵，实现了语义连贯。所以，相比于加注的补偿策略，译者发挥自身的文化创造性，变通地处理文化形象，让译入语读者收获了更为流畅自然的阅读体验，也更加符合当时文化传播的目的。

### 4.3 审美创造性之于语义连贯

戴译《边城》中将女主角翠翠的名字译为“Emerald”则是“音形意神”皆美。沈从文在原文中对于翠翠的描述莫过于世间最美好的人物：“眸子清明如水晶”“天真活泼”“如山头黄鹿”“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3]。戴乃迭在此处采用“换译”的方法，即译者将源语文化信息转化为译语时，替代源语的对应单位或者表达方式，以化解双语语形、语义、语用矛盾，符合译语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的全译方法[15]。译者在此发挥创造力，填补意义缺省，重构原文形象。与上例相同，译者在前文埋下伏笔，使用了词汇复现的方式，传达意义如“Because their home was among bamboos and hills of a glorious emerald green, the old boatman gave the poor mite the name Emerald [13]”。从“emerald green”中取一词“Emerald”作为女主的名字。Emerald 在《柯林斯英汉学习词典》中带有双重含义：一为祖母绿宝石；二为翠绿色。戴乃迭用“Emerald”一词代指女主，一个冰清玉洁形象跃然纸上，既保留了原文翠色的形象，又暗含了翠翠品质可贵，可见译者独具匠心，在不经意间已向读者描画了一副纯净无瑕的少女模样，多一分美感。

同样使用到换译技巧的为文中黄狗的名字，在《边城》原文中，翠翠家的黄狗一直无名，主人家只唤作“黄狗”或“狗”。书中，黄狗机敏伶俐，一直陪伴在爷孙俩

左右，就连摆渡时，也尽全力帮忙，“Brownie sits in the bow and adds to the general amusement by leaping ashore with the rope the moment they touch land.”

雉送与翠翠初见时，言语轻薄，这黄狗好似听得懂人话，“Brownie started barking again, as if aware that his mistress was offended.[13]”黄狗一直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守一方渡船，护主家安危。

而译者在此增译了黄狗的称呼，并且采用换译的手法，说明黄狗忠诚侍主的品格。戴乃迭在此将“黄狗”译为“Brownie”，根据 Wordnet 网站，“Brownie”指一种巧克力甜点，即布朗尼；又指欧美传说中的棕精灵，顽皮但亲人，对人类忠诚。译文不同于普遍的“Puppy, Doggy, Dog”这一类常用词，借词表明了狗的毛色，还点明了文中黄狗的特质。虽然译者替换了原文的形象，但在各自文化语境中找到对应形象，增添了一丝阅读的趣味性，同时译文的语篇连贯丝毫未损。

书中颇具深意的译名还有“老船夫”。老船夫作为翠翠的爷爷，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但是在全书中，竟无一处提及他姓甚名谁，只知他管着茶峒这一方渡船。戴译《边城》在此只将“老船夫”译为“ferryman”，全篇也仅以“ferryman”称呼。作为主线人物，作者却并不重视，未予其姓名。实际却恰好相反，老船夫的故事就从他的称呼展开。他从二十岁到七十岁，春去秋来渡了若干人，他的人生似乎无法与这方渡船分开，直至最后他的生命也随着渡船一起去了。作者在此并未提及这个人物的具体姓名，却在他的称呼中，揭示了人物的命运的中心“船”。译者正是因为理解的作者的深意，所以在译文中也早有铺垫：It is high time the sturdy old man retired, but evidently fate will otherwise: no throwing in his hand for him [13]。老船夫一生与船相依，随船而去。这恰好是人物最明显的特质，如增译其他代号，反倒遮盖了原文的巧思。如此一来，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读者初读时会倍觉疑惑，读完整本书，就觉恍然大悟，尤然生出一种回味无穷之感。创造者这一留白之举，给读者留下反复把玩的空间，审美价值最大程度保留了下来。

译者徘徊在双语双文化之间，感知原文意境，将心灵上的共鸣凝结在译语符号中，追求形美、音美、意美和神美。文学作品中角色名与角色通常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闻名即闻人。译者在处理文本中关键人物时，必然要顾及到人物形象的内在含义，兼顾其文学性与审美性，给予读者相同的审美感知。

## 5 结论

翻译不是数学公式的对等转化,而是一种语言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的重构。翻译要具有艺术美,要有情感,要有思想性。语言的异质性和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更加灵活,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即在其中体现,而译者的主体性又强化了翻译创造性的特点。

一个作品只有不断被解释被重构,其生命的长度和宽度才得以扩展。原作的价值分别体现在语言、文化、审美上。在语言层面上,翻译语言的创造性能够扩充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有利于源语言向外发展,促进语言文字的融合。在文化层面上,译者自主创造构建的文化空间,联通了两种文化,减轻了不同文化因子所带来的影响,促成文化的交流共建。在审美层面上,译者操纵文本,力求在语言符号中,统一音美、形美和意美,引发目标语读者的情感共鸣,提供对等的审美价值。

“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大趋势,文学作品外译已成必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目标语读者感知到源语之美,译者的工作就尤为重要。译者当注意语篇与词语之间的微妙联系,发挥创造性。换言之,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细节和艺术是要兼顾的。

角色名称作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一环,浓缩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译者作为语言文字的使用者要关注语言的异质性、文化精神的区别与审美的差异性,根据目的、需求特征,对文本中具有不同价值特征和价值度的信息加以控制和调节,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摈弃陈规旧俗,以求在新的文化时空重构出文本意义,保证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审美连贯性。

译者当打破习惯,独立创作,兼顾翻译中的多样性原则与灵活性原则,这才是翻译精神之体现,也是实现意义重构的有效策略与实现途径。只有因“文”制宜,以大融合求大发展,译者才能真正为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让中国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 参考文献

- [1] Cheng, W. Innovative Subjectivity of Transeditor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ed News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1, 11 (3), 215-231.
- [2] 周领顺. 译者行为研究的人本性 [J]. *外语研究*, 2022, 39 (02): 78-83+112.
- [3] Fenoulhet, J. The Rel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20, 20 (5): 497-505.
- [4] 王玉樑.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J]. *天府新论*, 1995 (06).
- [5]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 2003 (01): 21-26.
- [6] 许钧. 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 2003 (01): 9.
- [7] 廖志勤.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4 (3): 6.
- [8] 周领顺, 周怡珂.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 [J]. *外语学刊*, 2018 (01): 110-115.
- [9] 李淑侠. 论文化词语在翻译中的语义连贯与重构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3): 111-115.
- [10] 刘洪泉, 吴长青. 英文人名汉译规范之管见 [J]. *上海翻译*, 2009 (01): 57-61.
- [11] Charron, M. Naming and Translation/Naming in Translation: Toward a Close Reading of *Don Quijote* (Part I, Chapter I), *Names*, 2022, 57 (1): 17-29.
- [12]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 [J]. *北京: 中国翻译*, 2014, 35 (3): 82-88.
- [13] 沈从文. *边城* [M] 戴乃迭译,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15.
- [14] 俞樾. *春在堂随笔* [M].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15] 倪璐璐. “换译”之符号学诠释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6, (2): 39-42.